

海德格尔与安德斯技术批判思想比较

曾鼎森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2025年10月6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0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1月7日

摘要

本文通过比较马丁·海德格尔与京特·安德斯的技术批判思想, 揭示了后者对前者理论的继承性与激进转向。海德格尔以“集置”概念揭示现代技术作为一种促逼性“去蔽”方式的存在论本质, 奠定了技术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但其分析缺乏具体历史与伦理维度。安德斯则提出“装置”理论, 将“集置”的抽象力量具体化为作用于社会心理的机制, 并以“人的过时性”、“普罗米修斯羞愧”等概念, 对技术社会进行人类学-伦理学诊断, 从而将技术批判从存在之思推向一种具有道德紧迫性的行动呼吁。本研究不仅厘清了二者在技术本质理解上的谱系关联, 也凸显了安德斯思想在填补海德格尔理论“伦理-政治空缺”方面的重要价值, 为当代技术哲学提供了兼具深度与介入力的双重思想资源。

关键词

海德格尔, 安德斯, 技术哲学, 集置, 装置, 人的过时性

A Comparison of Heidegger's and Anders' Critiques of Technology

Dingsen Ze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October 6, 2025; accepted: October 27, 2025; published: November 7, 2025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Martin Heidegger's and Günther Anders' critiques of technology, revealing how the latter both inherits and radicalizes the former's thought. Heidegger's concept of "Ge-stell" exposes the ontological essence of modern technology as a coercive mode of revealing, establishing a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for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yet his analysis lacks concrete historical and ethical dimensions. Anders, through his theory of the "apparatus," concretizes the abstract force of "Ge-stell" into socio-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employing concepts such as "the obsolescence of

文章引用: 曾鼎森. 海德格尔与安德斯技术批判思想比较[J]. 哲学进展, 2025, 14(11): 130-134.

DOI: 10.12677/acpp.2025.1411564

man” and “Promethean shame” to offer an anthropological-ethical diagnosis of technological society. Thereby, he transforms technological critique from contemplative thought into a morally urgent call to action. This study not only clarifies the genea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technology’s essence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Anders’ work in filling the “ethical-political gap” in Heidegger’s theory, offering dual intellectual resources that combine depth with practical engagement for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Keywords

Martin Heidegger, Günther Ander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Ge-Stell (Enframing), Apparatus, Obsolescence of Ma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研究目的和背景

1.1. 研究背景

现代技术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驱动力与标志性现象，早已超越其工具性层面，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议题。在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思想图景中，对技术进行本体论反思的流派与思想家层出不穷，其中，马丁·海德格尔的贡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其后期哲学中，他通过“集置”这一革命性概念，将技术的本质阐释为一种具有天命色彩的“去蔽”方式，一种促逼着人与世界进入某种强制性秩序的框架性力量[1]。这一存在论层面的深刻洞察，超越了将技术视为中性工具或可完全为人所控之对象的传统观点，为整个技术哲学领域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础，成为后续几乎所有技术反思无法回避的思想资源[2]。

然而，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因其高度的抽象性、诗性语言及其对具体历史、政治与伦理问题的有意悬置而面临阐释上的挑战与争议。他将技术本质归结为“存在之天命”的宏大叙事，在提供深刻洞见的同时，也弱化了对其在具体社会现实中运作机制的分析，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关于责任与行动的规范性追问。这种“存在论”进路的优势与局限，共同构成了当前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研究的基本背景，也催生了将其思想与其他路径进行对话与互补的学术需求。

在此背景下，审视其思想遗产的多样化继承脉络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其学生京特·安德斯的技术批判理论提供了一个极具潜力却又被相对忽视的研究视角。安德斯作为二十世纪最早系统批判技术文明的哲学家之一，他构建了一套以“装置”、“普罗米修斯羞愧”和“宣传”为核心概念的、极具现实穿透力的分析框架。他的思想虽植根于欧陆哲学传统，却展现出与海德格尔截然不同的风格与旨趣：他更关注技术施加于人的具体心理效应、社会伦理后果以及核武器带来的生存性威胁，其写作充满了介入现实的紧迫感和鲜明的道德立场。目前，国内学界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研究已颇为深入，但对京特·安德斯的引介仍方兴未艾，将二者进行系统性的、深入的比较研究则更为罕见，这为本研究留下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系统性地比较海德格尔的“集置”思想与安德斯的“装置”批判理论，揭示二者之间存在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关系。本文力图证明：安德斯的工作可被视为对“集置”理论的具体化与彻底化；他将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论力量落实为作用于个体心理与社会关系的具体权力机制，并将一种沉思性的存在之思推向了一种要求当下介入的伦理-政治行动呼吁[3]。

在理论意义层面,第一,它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理解。通过安德斯这面“棱镜”,我们可以反观海德格尔思想的潜在生命力与其内在局限,尤其是在伦理-政治维度上的“空缺”。第二,它有助于推动国内学界对京特·安德斯这一相对冷门但极其重要的思想家的关注与研究,填补其在技术哲学脉络中定位的空白。第三,通过搭建二者之间的对话桥梁,本研究有助于勾勒出一条从“存在论批判”到“人类学-伦理学批判”的技术反思谱系,为理解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内部互动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案例。

在现实与实践意义层面,本研究回应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深刻技术困境。海德格尔的深刻性与安德斯的紧迫感,共同为我们提供了反思人工智能、算法治理、数字生存等当代议题的双重思想资源。他们的对话启示我们,面对技术浪潮,既需要深邃的本质性思考,也需要敏锐的现实关怀和坚定的行动勇气。因此,这一研究不仅是一项学术史梳理,更旨在参与和启迪关于如何构建一种与技术之自由关系的时代性思考。

2. 技术之本质的存在论追问

海德格尔追溯了“技术”的古希腊词源,指出它原初意指一种“知道-方式”,一种将真理带入显现的“艺术”,与“创造”同属“带出”意义上的“去蔽”方式。

然而,现代技术成为一种截然不同的去蔽方式。它不再是一种“带出”,而是一种“促逼”与“强求”。它要求自然提供可以被开采和储存的能量,将万物“摆置”为一种单调的、只在功能上有意义的“持存物”。海德格尔用“集置”一词来命名这种促逼性的去蔽方式,意味着那种“摆置着的聚集”,它将人、自然、世界都“集入”技术系统的强制性秩序之中。人也不例外,被摆置为“人力资源”[4]。

“集置”的危险在于,它使人遗忘了他真正的本质——此之在的绽出之生存,并遮蔽了另一种更原初的去蔽方式。然而,海德格尔指出,正是在这种危险中,也生长着拯救的可能。通过对技术之本质的深思,我们可能准备一种与技术的自由关系:一方面对技术物的必要使用说“是”,另一方面又能对其物化本质说“不”。这种转折的希望,他寄托于“思”与“诗”[5]。

海德格尔的贡献在于将技术问题彻底提升到了存在论的高度,揭示了现代性危机的形而上学根源。但他的分析也止步于此,对于“集置”如何具体地作用于人的生活、情感和社会的肌理,他并未多着笔墨。这个理论上的未充分展开之处,为安德斯的介入提供了空间。

3. 技术时代的人类学诊断

安德斯理论的起点是一个核心论断:人正在变得“过时”。这种过时性是人类学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逆人类学的时代”,即技术世界的变化速度远超于人类自身情感与理解力的演化速度,导致人与自己创造的世界之间出现了一种“垂悬的差异”。

这种差异最典型的表现是“普罗米修斯羞愧”。现代人面对自己创造的精致、强大、耐久的机器(装置)时,感到的却是对自己肉身凡胎的羞愧感。这种羞愧感驱使人们不断地通过消费、升级技术产品来弥补自身的“缺陷”,从而更深地卷入技术系统。

安德斯提出了一个关键区分:在传统社会中,我们是“拥有”商品;在装置社会中,我们是通过“拥有”和“使用”装置来“是”什么。我们的身份、价值和社会认同由我们与装置的关系所定义。装置通过其存在本身就在进行着不间断的“宣传”。这种宣传是一种更隐秘、更强大的“存在性宣传”:它通过其纯粹存在和无处不在,让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它所带来的世界秩序,并将其视为唯一的可能。

安德斯的分析充满了经验的、心理学的细节。他讨论了电视、核武器等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感知和无能。他将海德格尔抽象的“遗忘存在”转化为了一种具体的、“无力于想象灾难”的现代人心理病症。

4. “集置”与“装置”：一种批判性继承与激进化转向

4.1. 从本体论命运到心理学症候

海德格尔的“集置”揭示了一种存在论层面的技术本质：它作为一种非人格的、命运般的“遣送”，将世界与人纳入一种强制性的秩序之中，使其沦为“持存物”。这一分析虽具深刻性，却因其高度抽象而难以触及技术运作的具体机制。

安德斯的“装置”理论则将这一形而上力量转化为可感知的社会心理现实。他将“集置”所描述的存在论结构，具体化为作用于个体情感、认知与行为的权力网络。例如，“普罗米修斯羞愧”不仅是心理现象，更是“集置”在主体性层面的回响——人在技术产品面前的自卑，正是“人被摆置为持存物”在情感结构中的体现。安德斯以此将海德格尔的“存在遗忘”转化为一种现代人的心理症候：无力想象灾难、无力感受责任。

4.2. 从沉思的希望到行动的紧迫

海德格尔面对技术之危险，提出以“泰然任之”与“诗意栖居”作为回应[6]。这是一种近乎审美救赎的态度，强调在思与诗中重新接近存在，却缺乏明确的伦理指向与实践路径[7]。

安德斯则彻底将技术问题推向伦理与政治的领域。他认为，核武器与生态危机不是遥远的存在论危机，而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技术批判因此不再是哲学沉思，而是道德命令。他呼吁进行“恐惧的启蒙”，主张我们必须从被动的“接受命运”转向主动的“阻止灾难”。这种转向，不仅是对海德格尔理论中行动维度的补充，更是一种根本性的立场转换。

4.3. 对人的不同定位：根本分歧所在

两者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人”的理解与期待。

海德格尔极力避免从“人”出发对抗技术，认为那将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8]。他将人理解为“此-在”，是存在的守护者，其尊严在于“绽出之生存”。技术问题因此是存在历史的问题，而非人的问题。

安德斯则毫不回避地站在一种修正的人道主义立场。他关注的是具体的人在技术社会中的异化、羞愧与无力。对他而言，捍卫人的情感完整性、想象力与道德能力，是应对技术危机的核心。他并不惧怕被指责为“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在文明可能自我毁灭的当下，人的生存与尊严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伦理起点。

5. 结论

通过这场将京特·安德斯与马丁·海德格尔并置的比较研究，我们得以窥见技术哲学中一条往往被忽视的传承与转化脉络。海德格尔的“集置”概念以其无与伦比的哲学深度，为我们揭示了现代技术那种非人格的、存在论层面的运作本质，奠定了所有后续批判的形而上学基础[9]。然而，其思想的抽象性与现实感的缺乏，也呼唤着一种更贴近大地、更具介入性的回应。

京特·安德斯正是这一回应的杰出代表。他并非简单地应用海德格尔的思想，而是以一种“叛逆性的继承”方式，将其激进化了。他将“集置”转化为“装置”，将“存在之遗忘”诊断为“人的过时性”与“普罗米修斯羞愧”，将“危险”具象化为核毁灭的威胁，并最终将一种沉思性的“泰然任之”扭转为一种充满道德紧迫感的“行动呼吁”。在这个过程中，他填补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伦理-政治维度，将技术批判从存在的高空拉回到了人类生存的严峻现实之中。

因此，安德斯并非海德格尔的一个简单注脚，而是一个重要的批判性对话者。他的工作表明，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既是一个丰沛的源泉，也可能是一个需要被逾越的起点。对于身处技术浪潮愈发汹涌的

今天的我们而言，这两条思想路径并非互斥，而是构成了反思技术时代不可或缺的双重维度：既需要海德格尔式的深刻，以洞察技术的本质性架构；也需要安德斯式的尖锐，以唤醒我们对具体危险的感知和行动的勇气[10]。他们的思想共同构成了一幅更完整、更富张力的技术批判图景，持续要求着我们在这个被“集置”所笼罩、被“装置”所填充的世界中，思考人之为人的意义与未来。

参考文献

- [1] 董军. 海德格尔技术之思及其当代启示[J]. 学习与实践, 2021(9): 136-142.
- [2] 李建盛. 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真理的美学阐释[J]. 北京社会科学, 2015(4): 117-123.
- [3] Zimmerman, M. (1990) *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Modernity: Technology, Politics, Ar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4] 汪世锦. 海德格尔人的本真生存思想探析——以马克思主义为分析视角[J]. 江汉论坛, 2020(5): 35-41.
- [5] 邹小婷, 扈中平. 海德格尔诗性哲学视域下当代教育人性化的困境及其出路[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8(3): 11-18.
- [6] 王中原. 自然向人文的自行生成: 一个探讨自然美的新维度[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7(4): 133-139.
- [7] 陈攀文, 沈亚生. 海德格尔源始伦理学中的共在主体性[J]. 伦理学研究, 2015, 76(2): 51-55.
- [8] 李霞玲, 李敏伦. 国外海德格尔环境哲学研究综述[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5, 31(4): 29-32.
- [9] 赵奎英. 海德格尔生态伦理学的三大特征及其生态诗学意义[J]. 东岳论丛, 2017, 38(1): 107-113.
- [10] 江飞. 生态存在论美学: 世界生态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形态[J]. 东岳论丛, 2024, 45(12): 84-91.